

● [瑞典] 达格芬·嘉图 著
●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下 走何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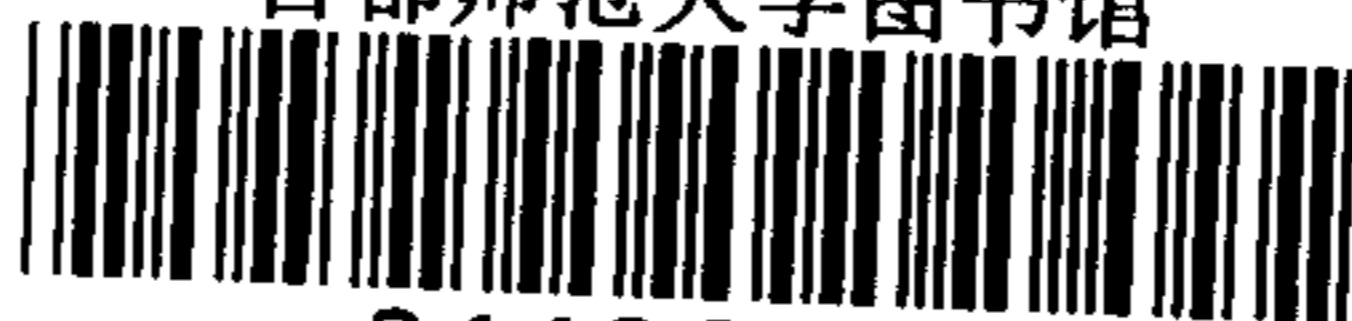


走向革命

——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
中国共产党 1937—1945

[瑞典] 达格芬·嘉图 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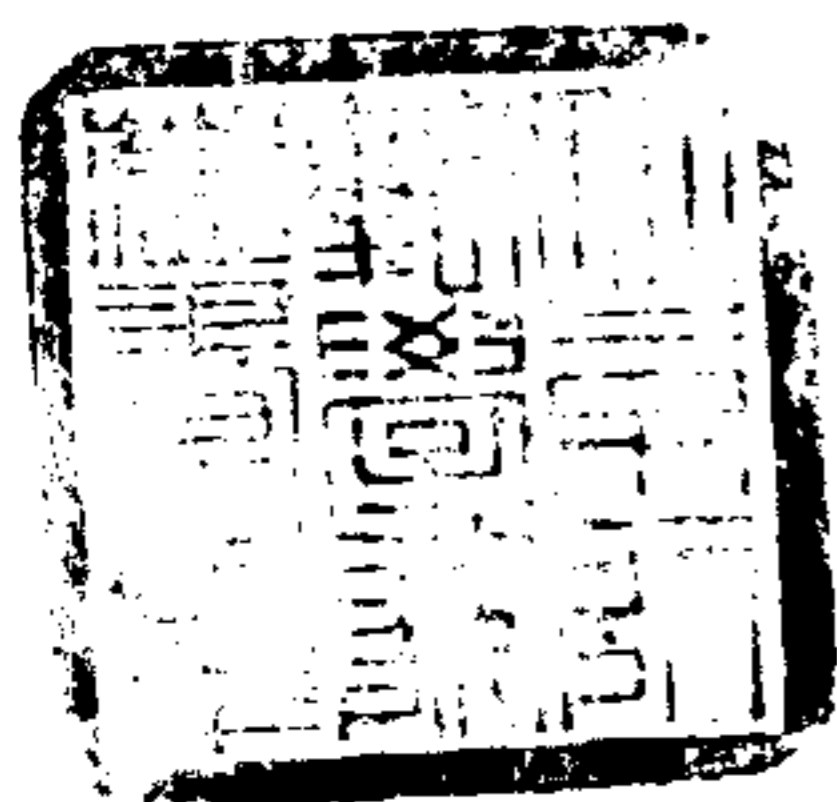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933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1129332

走向革命
——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
中国共产党1937—1945

〔瑞典〕达格芬·嘉图 著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 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25印张 334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200册

ISBN 7-80023-020-1/K·73
书号 11310·69 定价 2.70元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
1983年英文原版（第1版）译出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专著。作者以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为着眼点，阐述了这些政策所导致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的深远变化，探讨了党的经济、政治政策与抗战军事任务的有机联系，并从中寻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内在原因。从总体上看，本书的论述角度较新颖，研究较客观，资料较全面，特别是作者大量使用的日本方面保存的我抗日根据地党的文件资料，是国内难以见到的。以上种种，对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作者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全都核实。个别人物、地点、书刊和文件的名称，在确实查不到出处和标准译法的情况下只好揣译。原书书末文献目录中的英文书目和日文书目，因和注释部分的有关内容重复，都略去未译。文献目录中还有个别书名和资料名，作者本身就未注明版本出处。此外，作者在书中把抗战时期的北平一概称作北京，对此，我们亦未作改动。再者，凡我们在书中添加的注释，均以“译注”字样标明。

在本书的整个翻译校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张天荣、何理老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孙培恕教授，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光辉老师等的大力帮助和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4月

鸣 谢

如果不是幸运地得到了广泛的帮助，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安藤正、弗兰克·鲍德温、古岛一夫教授、琳达·格罗夫、小岛教授、哥拉恩·马尔格韦斯特、中野秀美、铃木豊、内田友行、山岸秀夫和山内一夫教授所给予的广泛而真诚的捐助，使我受惠不浅。非常感谢东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东京经济发展学院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它们向我提供了便利和优越的研究环境。感谢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京文库和东京大学东方文化学院，它们使我得以见到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我还要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所给予的慷慨的财政资助。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抗战的深远意义和重要发展	(7)
第一节 战争的双重性质	(7)
第二节 准备出场的人物	(15)
第三节 阶段	(21)
第四节 地区差别	(29)
第五节 边区的形成	(34)
第六节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 A	(40)
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 B	(45)
第七节 勾结	(58)
第八节 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65)
第九节 政策的调整	(74)
第二章 战争、社会变革和阶级	(78)
第一节 日军的暴行和人民的抵抗	(78)
第二节 农村的变革和群众的参战	(81)
第三节 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89)
第三章 1937—1940年：溃退、阶级斗争与扩张	(93)
第一节 初期的占领	(93)
第二节 溃散与混乱	(98)
第三节 新政府和群众政治的开始	(101)

第四节	税收制度贯彻中的临时性与不稳定性·····	(115)
第五节	党的发展——数量与质量·····	(121)
第六节	军队的建设·····	(124)
第四章	从内线防御到人民战争·····	(135)
第一节	“强化治安”·····	(135)
第二节	与生产相结合·····	(138)
第三节	军队化整为零·····	(141)
第五章	1941—1945年：调整和群众的权力·····	(147)
第一节	党和群众的活动与斗争·····	(148)
第二节	统一累进税·····	(161)
第三节	减租减息·····	(168)
第四节	土地政策的转变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187)
第五节	生产运动·····	(201)
第六节	合作劳动·····	(209)
第七节	财政·····	(223)
第八节	战争与生产相联系·····	(229)
第九节	人民参政·····	(242)
第十节	社会变革与人民战争·····	(259)
第六章	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变化·····	(263)
第一节	教育·····	(263)
第二节	报纸·····	(275)
第三节	妇女·····	(277)
注释	·····	(286)
1941年以来延安《解放日报》有关文章的目录	·····	(343)

引 言

共产党人菲茨杰拉德在描述 1937—1945 年的中日战争时写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公开的、其事实在当时很少被大多数中国人和外部世界得知的战争。”^①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了解这场战争，至少是它的社会历史。八年抗战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分水岭，更是出人意外。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一支能够直接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力量。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场革命运动发展得如此神速。”^②

试图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是查尔默斯·A·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1962 年)^③。对中共战时政策的动力缺乏研究，是此书的民族主义论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对其加以评论）引起论战的一个原因^④。有两篇博士论文（李·尼哥克，1968 年^⑤，卡尔·依·多列斯，1975 年^⑥）特别论述了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基础问题。从战略上说，占领这个地区比占领华中华南远为重要。在这个地区，中共坚定地站稳了脚跟，发展了党员，补充了军队。1974 年，片岗哲也的著作也涉及了这个问题^⑦。和约翰逊相比，这后三位作者都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思索中共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分析与战时中共力量的扩张分不开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与农民当中较贫穷的部分（下称贫农和中农）的客观利益相符合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开展和支撑真正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我按照他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使用客观以及主观的因素、条件等术语）。第二，对于进行艰苦斗争的农民来说，（动员他们

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即推翻旧的、顽固的统治势力的阻碍的必要性,必定意味着阶级调和是不可能的。第三,阶级斗争的目标,不是把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消灭,而是吸收这些人,使他们居于次要地位,利用他们,因为这种斗争需要广泛地动员群众。这就是农村的联合战线。

尼哥克、多列斯和片岗哲也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不过,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动态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实质性的影响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农村财富重新分配的事实,尽管他们对改组后的政府行政机构中阶级力量的变动很少论述,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变化的一致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的、辩证的关系也没有进行综合的、有条理的分析——例如,没有详细阐述对地主、富农的垄断地位的剥夺是怎样强烈地影响着中农尤其是贫农的。

我更强调这些根本性的变化与中共在以后的内战中以席卷千里之势所迅速获得的胜利的有机联系。我还不同于这三个作家的地方,是注意到了军事任务与努力发展经济的关系。对这种相互关系,我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论述。把这三位作家混为一谈是不公正的。李·尼哥克的论述尽管简短,但或许因为他是唯一广泛利用了最普遍且最有价值的主要资料——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人,到目前为止,他对社会变化的实质的看法仍是最敏锐的;多列斯特别注意枝节问题,经常看不到发展的主流。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农村社会的改变如何成为1937年至1945年中共在华北敌后急剧地、大规模地扩张的条件,以及它如何使各阶级的力量均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并不打算对中共的政策、实践作全面论述。在交代了基本背景后,我集中阐述的是那些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改组带来了影响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本中日战争史。读者将会发现,这里边没有或几乎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或党内的政策争端。当然也有例外,但它们并不妨碍上述本书主题的基本连贯性,至少在对党的基本

政策的推行的介绍上是这样。再说，领导之间的分歧已受到了我特别的注意。

毫无疑问，对政府和官僚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的情况加以阐述，将会提高本文的价值，但由于材料缺乏，这一点只得作罢。任何详细的法令和法律都可以得到，但是这些组织的实际作用却很难描述，因为不仅明显地存在着地区差别，而且实践活动和指示、法令也常常不一致。不过这一类令人遗憾的缺漏，并不影响我的基本结论。

尽管一般的特征很明显，但资料的不完全给确定阶级结构和阶级界限带来了困难。在区别农村的阶层或阶级时，我运用了中共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或者雇农的标准。这种划分标准是1933年10月首次提出的，以后并没有做大的修改：（1）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2）富农。在通常占有一部分土地的同时，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3）中农。经常受剥削，但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不从事剥削。“许多”中农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有一部土地，另租入一部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或主要靠自己劳动。”（4）贫农。区别于中农的主要标志是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有“一部分不完全的工具”，不得不至少租一部分必要的土地来耕种，以维持生计，“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5）工人或者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⑥。

学者们一般认为，华北的租佃并不象南方那样广泛。注意到对地主、富农的宽泛定义很重要，他们的剥削并不必然地表现为

地租形式。进一步说，农村的改组使地主和富农居于次要地位，这是符合上述后三个阶级，特别是大量贫农的客观利益和要求的。所以，这种划分看起来象是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划线（还有一些既不是剥削者又不是被剥削者的人）。根据上述 1933 年的文件，地主阶级事实上不可能主要地或者完全地只参预经济过程：“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故压迫者与剥削者是同一的。

战时党的文件经常使用不同的术语（最为流行者有如“土豪”、“劣绅”，也有大量其它的称呼），地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规定清楚地主的活动的特殊本质。为了平息自下而来的对农村的根本改革的挑战，地主以及富农被联合成一支成份极不纯的（充满尖锐矛盾的）力量——尽管极不稳固，这是党要达到的重要改革目标。各种其它的名称由于方便的原因也在本文采用，如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集团、绅士、富人等。

改组农村的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强调。然而地区的差别，尤其是各地在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上的相当大的差别，使这种特殊的、辩证的相互联系趋于多样化。在某个局部，一定的政策可能是不相关或者不重要的。例如，在租佃关系并不普遍的地区，减租减息可能并没有普遍实行；而在另一个地区，这个政策可能又是决定性的。所以，就理解战争期间中共的大发展与群众的广泛动员的关系而言，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改革动因或者因素能提供答案，我们必须看到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当然，在使农村社会革命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巩固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和在核心地区贯彻的过程中，党的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有些政策会更重要一些。

尽管局部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及正如我在许多地方所说的实际政策的落实很不平衡，历史性的重要趋势还是清晰地在社会变化这个主题上集中展现了出来。诚然，党的纲领的真正深刻的影响，仅仅在党控制下的相对小的地区才或多或少地看得清楚，然

而，乡村中发生的变化却是一种质变，并且在广泛地展开和延伸。这种变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1948—1949年统治权的易手，激起了中国革命的群众性大变动。正是由于没有能力掌握社会变化的辩证法，迈克尔·林赛才认为中共力量扩展的原因在于战争后期日军的撤退。按照林赛的观点，假如不撤退的话，“日本人或许就能够把华北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地下组织的水平，华北共军也只能是一些零散的山区游击队”^⑥。

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也称边区，这种社会变化发展得最彻底。本文涉及到四块这样的地区：比较先进和广阔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地区，晋绥和山东地区（参看第一章第五节）。顺便指出，本书考察的重点是边区较稳定的地方，因而对党的政策在整个边区贯彻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难免有照顾不到之处。

关于原始的中共文件，我们已经注意到1941年在延安创刊的《解放日报》的重要性。它刊有大量的，来自敌后边区的有很高资料价值的报告。《解放》周刊（它的出版周期有时拖得更长）也载有涉及各个领域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群众》和《八路军军政杂志》虽相对次要一些，但也有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也是被经常引用的期刊。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各种题目的战时材料集，其中包括石进堂的《生产运动·互助》和《教育杂志》。一些非中共人士办的中国杂志和一些中国作家的采访报道也被采用。他们包括丁玲、陈克寒、李公朴、李菁、周而复、周立波，他们都是中共的同情者，或许陈克寒更甚。他们是想严肃地探讨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宣传家。

关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战后党的原始资料作了特别多的阐述，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但并不侧重于分析。对于很难详尽论述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来说，这是很正常的。然而，也有两点很明显的例外，即齐武关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发展的研究以及李成瑞关于税收引起各阶级沉浮的调查。就齐武来说，他突然意识到了在考察逐步形成的革命性变化的过程时不能与官方关于战时中共地位

的解释相悖的必要性。在战时能够缓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矛盾的重要的统一战线宣传，令人费解地延续到了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东亚》、《满铁调查月报》的文章和狩屋久太郎及草野文男的书以外，战争时期日本方面的材料都是保密的。《情报》、《通讯》、《特殊情报》和《思想月报》上的许多文章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指当时日方翻译的中文资料——译注），而《剿共指南》中的那些文章是日本的研究者写的。经常被引用的一部著作是多卷本的《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农业政策》（1941年），其中有许多翻译过来的中共地方文件，并进行了分析。两卷本的《北支治安战》（日本防卫厅1968—1971年出版），含有军队的调查材料，也有很大的用途。

在谈到由访问过中共地区的西方观察家撰写的书和文章时，人们一定记得，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旅行，并不是有紧密组织的、象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惯例那样的旅行。但尽管有大量的日本和国民党^⑩特务进行文化围剿和搞屠杀活动，西方观察家实际上仍能在这个地区活动，并且从特务的监视中安全地摆脱出来。

有两个人的名字，由于其卓越的报告，特别值得提出来，他们是杰克·贝尔登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前者生动的、脍炙人口的《中国震撼世界》，不仅有描写内战时期的材料，而且有抗战时期的材料，包括他自己收集和采访的材料。史沫特莱的《中国向落后开战》，是一篇非凡的但被忽视了的、描述她在战争初期和八路军在一起时的见闻的著作^⑪。和贝尔登的某种程度的超然处理相对照，史沫特莱坚定地献身于中共的理想事业，然而她审慎地把握着自己独立的判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毫无疑义地让他们的领导者安排。”^⑫ 她为在采访中共各级领导或官员时能够了解到如此多的情况而感动。这对于I·爱泼斯坦的《中国没有完成的革命》和T·A·比斯恩的《1937年6月在延安》来说，也确实如此。

第一章

抗战的深远意义和重要发展

第一节 战争的双重性质

战时中共官方的声明强调民族团结，但团结不是无代价的，而是又团结又斗争，中共仍然强烈坚持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许多文章也都表明了这场战争的两重性质，即反帝和社会的变化。

毛泽东在论述战时党的双重目标时，几乎是惊人的坦率，1937年6月，他对新闻记者T·A·比斯恩说：

“这（指抗日）也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因为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在中国，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革命是会成功的。”^①

确实，在中共控制的地区，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取得了成效。1938年5月，毛泽东大胆地预言，这场战争就是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变旧中国为新中国^②。中共的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更明确地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在1942年首次阐明：这场战争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他还说：“自从‘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内部的阶级平衡和民族力量已经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抗战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的思想观念也将被赋予新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含义。”^③

反对帝国主义

就反帝斗争来说，党的领袖们经常把抗日战争看作是100年

来，即从中国的主权开始受到侵犯以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统治所进行的斗争的高潮的一幕。所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人民决心使自己摆脱一切外国征服的枷锁。这里有两个例子：

宣传部长凯丰写道：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 45000 万人民，具有 1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文如此——译注)和 5000 年文明的历史，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侮剥削和压迫。但是现在中国人民举起抗日的大旗，保卫自己的国土，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确切地说，由于这些战争(1840 年、1856—1860 年的鸦片战争，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从 1931 年开始的日本侵入中国东北的战争和 1932 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暴露了中国的衰落和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视欺侮和他们的贪婪野心恶性膨胀了。现在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反抗就夺走中国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和彻底的解放。”④

毛泽东宣布：

“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在蒙受百年来的欺侮、侵略和压迫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以后，那种中国人民无法忍受的奴役已经完全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已奔赴战场，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进行保卫祖国的战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⑤

这场战争的反帝性质，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文件中也得到了强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100 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然而这场战争就不同了，……(这场战争)扫除了过去的一切失败和倒退。”⑥

社会变化

这是我讨论的中心问题。要通过进行灵活的群众游击战而不是正面对抗，来挫败日本的企图建立对中国的牢固统治的基本目

标，如果没有一个深远的社会变化，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所以，我将简要地叙述使得中国革命能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取得巨大进展的广泛、深刻的农村变化的概貌。

由于日本的进攻，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社会秩序的混乱中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各级行政机构的迅速崩溃和大大恶化的经济条件，暴露了战前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衰弱。在乡村，广大农民彻底地脱离了地主的统治。地主只知道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而对创造任何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代表体制的形式则毫无兴趣。因此，如为了推动强有力的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而试图恢复战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徒劳的。在那种体制下，农民对抗战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让那种体制在战争中毁灭掉而不是修复起来。

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要能够有效地处理突出的农村问题，并且，还必须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相符合，没有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不靠他们在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这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党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个生命攸关的改造问题。例如，毛泽东对新闻记者哈道·汉森说：

“我相信，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得到农民的合作。”^⑦

日本的情报机构经常作出同样的判断^⑧。这些变革，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它们指明了农民保卫自己家园的利害关系。农村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农村权力关系的调整，是进行抗战的先决条件。上面曾提到的压在农民身上的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必须减轻，这个迫切任务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应付战争的破坏和普遍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是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军队的庞大军费开支。实行减租减息和新的税收制度，是减少人民困苦的马上见效的实际措施。那些抗日活动搞得朝气蓬勃，农民大量地踊跃地参加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地区，正是坚决落实了救济贫苦